

· 探索与争鸣 ·

私营工商业改造中资本家摘帽子问题初探

叶 扬 兵

〔摘要〕 本文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探讨了私营工商业者为了摘掉资本家“帽子”而纷纷要求加入公私合营这一似乎众人皆知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的问题；选取几位工商业者及家属的发言记录，真实反映了背负资本家“帽子”给他们所带来的沉重精神压力；着力考察 1955 年 10 月毛泽东的郑重承诺与随后政府方面的初步设想这两个涉及资本家“摘帽子”问题的关键环节，进而阐释在高潮中摘掉资本家“帽子”似乎指日可待的原因。

〔关键词〕 私营工商业改造；资本家；毛泽东；公私合营

〔中图分类号〕 D232；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6)-09-0091-08

Study on Removing Capitalists “Hat” in the Private Industry and Business Reform

Ye Yangbi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many archives, and discusses that the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in order to remove the capitalists “hat”, have asked to join this public-private enterprises, which seems to be a well-known matter, but very few people can say clearly. This paper selects some speech which was made by several business people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hich reflect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usinessmen’s heavy ment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ir capitalists “hat” after “the movement against five evils”. This paper studies Mao Zedong’s solemn commitment at the end of October 1955 and the subsequent the government’s preliminary idea about the key of “removing hat” in 1956.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removing capitalists “hat” seems to be close at hand in the climax.

目前，学术界大都认识到，“五反”运动后，背负资本家“帽子”的工商业者便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为了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便积极踊跃地要求加入公私合营。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此仅有一些零散论述，故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一、资本家“帽子”带来沉重的思想负担

“五反”运动后，资本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形象一落千丈。不仅资本家本人自惭形秽，而且他们的家属也觉得低人一等。这种浓厚的自

卑意识，成为资本家及其家属的沉重精神负担。对此，一些学者根据已经出版的武汉、上海等地的档案资料提供了一些零星的证据。如湖北省武汉市一些工商业者，“普遍抱怨自己阶级成分不好”。有的工商资本家不敢说自己是做生意的，说是搞商业工作，“免得别人说是资本家”。有的资本家申请为小生产者，未被批准就要赖不干或辞去工人；有的资本家家属朝夕争吵要去掉“资属”这顶“臭帽子”。^① 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中，“五反”运动前有 1/3 的

^① 李立志 《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57 页。

同学毕业后想当资本家。但是，“五反”运动后只剩下2名想当资本家。^①荣毅仁在公私合营高潮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孩子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②。实际上，类似零散的资料还有一些。如廖承志1956年初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到，有人说“过去资本家门前真是路断人稀。”“做妻子的埋怨嫁给资本家是倒霉，做儿女的埋怨不幸生在资产阶级家庭里。”^③

笔者在江苏省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过程中，发现了《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汇刊》。该刊汇集了1956年初江苏省众多工商业者及家属子女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其中，有几位人士充满感性的发言，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切地感受工商业者背负资本家“帽子”所带来的沉重精神负担，故下面不妨稍作详细摘引。

无锡县一位60多岁老经理说：解放6年来，我认为蚕种对于国家对于民生是有利的，“前途一定是有希望的”。“但是我是一个资产阶级，认为是不光荣的，见人低三寸，说话吞吞吐吐，以我本人性情心直口快，有啥说啥，是不合胃口，心上非常苦闷，不知哪个时候才可把资本家的帽子脱掉呢？”^④

泰州市协泰五洋商号的经理谈大樟，原是副经理。他在“五反”运动后，“就产生了怕做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没有前途，做资产阶级不光荣，资产阶级不能再干下去的思想”，于是，便消极经营，趁企业里有正经理主持搞业务，自己就到工商联里参加社会活动，希望“能够早一天去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参加工商联工作后，积极工作，在大会小会上，经常对工商界群众进行教育，宣传党的政策，说明“资产阶级只要爱国守法，真诚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定有光明前途的”。可是，他自己“依然存在怕做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外面讲得漂亮，可是回家对爱人谈起来又是一套。他要爱人多学文化，多做街道工作，不要与工商界妇女接触，“思想动机就是希望她在其他阶层找个出路”。他总认为自己是“投错了胎”，做一

个资方代理人，因此动员爱人多做街道工作，就是怕再沾到资产阶级的“咸味”。1955年春天，企业经理达子钧病故，他“痛哭流涕”，“万分伤心”，“当时就差神经失常”。别人不明究竟，还以为他和经理感情相处得好，舍不得和经理“生离死别”。但是，据他后来的表白：“实际上，我是眼泪流得下来，嘴里说不出来，就是以为他死了以后，我再也不能逃脱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了，因此就加深了顾虑：第一是资产阶级帽子脱不掉，反而要顶经理名；第二是企业搞不好，劳资关系吃不消；第三是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关难过。”^⑤

镇江一位工商业者家属是一个有普通文化程度的妇女。她具有浓厚的爱面子观点，认为“自己做了资产阶级家属是非常不光彩的”，所以她不论在那里，经常存在着最好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家属才好的想法。例如，在填写小孩在学校内表格家庭成分栏内，只写工商界或者加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小字，以为这样就好些。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妇联工作，并参加合作社工作。在“五反”运动中，她思想上“七上八下的”，“非常不安”。她怀疑政府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连资产阶级家属也要被淘汰了。当时她恨自己阶级成分不好，没有前途，就是参加工作的也要被淘汰了，不如自己早点儿辞职反而落得个漂亮。同时也觉得妇女是翻

① 桂勇、吕大乐、邹曼《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历史的启示——以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② 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③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办公室编《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8页。

④ 无锡县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三五馆蚕种制造厂经理陆子容的发言，《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汇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6—5。

⑤ 泰州市工商联区分会主任委员、协泰五洋号经理谈大樟的发言，《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汇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6—5。

身了，但是资产阶级家庭妇女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就辞去合作社的工作，也不愿再参加妇联工作，反正没前途了。她丈夫原是棉布店的股东，1954年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结束了批发业务，转业为织布厂。在筹备过程中，丈夫被推举为织布厂经理。她“知道了很不高兴”，以为丈夫过去做了布店股东，把自己的前途都送掉了，现在还做什么经理，又代人家背包袱了。她“非常自卑”，经常向丈夫说不要再担任经理，做负责人没好处。^①

从上述发言中不难看出，背负着资本家“帽子”，对许多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子女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党对工商业者的普遍宣传是，只要爱国守法，真诚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如195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曾这样谈到资本家的前途：资本主义零售商中的资本家“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来说，是一定要消灭的，这是历史规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个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来说，大部分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他们也只有接受改造，才能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抗拒改造是没有前途的”^②。其时，一些大中型私营工业企业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似乎进入了“半社会主义”，这些资本家也由此成为令人羡慕的“半个公家人”。然而，很多中小型私营工业和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业都无缘跻身于公私合营之列，因此，这些工商业者并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普遍害怕社会主义关难过。况且，在当时宣传中，也从未具体谈到何时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怎样才能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这就使得工商业者普遍感到非常苦闷。

二、毛泽东承诺的光明前途

目前，学术界大都意识到，一些工商业者想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是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一个重要动机。可是，很少有人能够详细地说明这些工商业者为何产生“摘帽子”的想法，因而无法完整地揭示事情的

来龙去脉。实际上，工商业者摘掉资本家“帽子”的想法，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毛泽东1955年10月的郑重承诺。

在很多工商业者为背负资本家的“帽子”而倍感苦闷之际，毛泽东及时地向资本家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光明前途。

1955年秋，在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同时，毛泽东又开始酝酿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人物，并进行谈话。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宣讲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10月29日，毛泽东特意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这两次座谈中，毛泽东都发表讲话，其中心意思是勉励私营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特意澄清共产党将继续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明确而郑重承诺资本家将来可以变成工人阶级，仅在10月29日讲话中就先后提过两次。

在展望国家的发展远景时，毛泽东首次承诺资本家将来还可以成为工人阶级。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得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③

其后，毛泽东在阐述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后，又再次明确承诺改造完成后资本家将来可以转变为工人阶级。

- ① 《镇江市工商界家属孙瑞如的发言》，《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汇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6—5。
- ② 萧林《私营零售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8页。
-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他指出“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①

应该指出，毛泽东的郑重承诺，是此前宣传中所从未有过的。在此前的宣传中，往往只是笼统地说，资本家经过改造后可以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从未明确提及资本家可以摘掉“帽子”变成工人阶级。因此，1955年10月毛泽东郑重承诺是私营工商业者后来产生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可以摘掉资本家“帽子”想法的源头。

毛泽东的郑重承诺迅速在工商界内部和社会舆论上反映出来。如1955年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发表的《告全国工商界书》就明确指出“今后，只要我们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继续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逐步加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觉悟，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逐步培养自己的劳动热情和劳动技能，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就有可能逐步地改造和提高自己，最后参加到工人阶级的光荣行列。到那时，我们不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了。”^②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也明确指出“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份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③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毛泽东的承诺，还是《告全国工商界书》和《人民日报》社论，都讲得非常清楚明白，就是将来资本家改造好了（即放弃剥削，自食其力）后可以变成工人

阶级，但并未说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就马上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

三、政府对资本家“摘帽子”的初步设想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郑重承诺为资本家展现了光明前途，这一全新的远景对工商业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使他们欢欣鼓舞，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加入公私合营后就能马上摘掉资本家的“帽子”，那么，工商业者为什么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要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公私合营，并期望早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呢？笔者对此一度颇感困惑，几经搜寻，终于从蛛丝马迹中隐约地看出一些端倪：在毛泽东明确承诺将来资本家可以摘掉“帽子”后，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省市又对资本家“摘帽子”问题作过一些初步设想和考虑。

笔者在南京市档案馆中见到一份题名为《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方针、政策、措施的问题和意见》的文稿。该文稿列举了关于定息、清产定股和征税方面的若干问题、关于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摘帽子问题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该文稿形成具体时间不详，但每个问题往往谈及几种不同的意见或各地不同的主张，估计是中央有关部门内部的初步讨论稿，印发各地参考和征询意见的，其形成时间应该是1955年底1956年初。这里不妨摘录“摘帽子”问题的相关内容：

（一）一般条件：放弃剥削，自食其力（也有人主张加上政治态度好、思想上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二）步骤：1955年底以前合营的企业，对已经放弃剥削和虽有轻微剥削而愿意放弃的资本家代理人，在1956年内摘去一批，树立榜样，表现好的，吸收入工会（正式会员或候补）。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296页

②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6页。

③ 《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2日。

(三) 新合营的企业, 凡不是资本家的不要戴资本家的帽子。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界限是: 工业, 一般以雇用满 4 人的为资本家, 若业主是主要劳动, 虽雇工满 4 人亦不作为资本家。商业, 一般以雇工满 2 人的为资本家, 若资金大的虽雇工不满 2 人, 亦可划为资本家。另一种意见: 工业, 资产在 1000 元以下, 参加劳动, 剥削收入不超过生活来源 30% 的为小业主。商业, 除夫妻店走合作化道路外, 流动资金在 1000 元以下, 参加经营, 剥削收入不超过 20% 的为小业主。

(四) 对于新合营企业资本家代理人, 有不同意见: (1) 1956 年内一律不动; (2) 没有股份或股份不大的工程技术人员, 和职工关系不太恶劣者, 可以在合营后即摘去帽子; (3) 凡不作私方代表的, 都摘去帽子。

(五) 摘帽子的形式: 一种意见是不开会宣布, 只要吸收他们参加工会活动, 并按劳保条例由企业提取工资的 3% 转入工会劳保基金户就算是摘帽子了。

(六) 工龄计算, 有如下不同意见: (1) 从摘帽子之日算起; (2) 从参加企业工作之日起, 扣除担任代理人的年限; (3) 从参加企业工作之日起算。

(七) 参加工会: 有的摘帽子后即吸收参加工会 (正式会员或候补), 有的暂时不参加。

(八) 参加工会条件: 按工会章程。^①

从上述摘引内容来看, 中共中央高层并未对资本家“摘帽子”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和作出详细的日程安排。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的。按照当时看法, 公私合营还只是 3/4 的社会主义, 到“实行国有化浪潮” (即取消定息) 还要到 1960 年前,^② 因此, 资本家“摘帽子”工作主要是将来进行的, 还非当时考虑的当务之急, 也就难以有具体的时间规划。

不过, 中央高层已经对资本家摘掉“帽子”的相关问题有了初步设想: (1) 为了树立良好的榜样, 准备让一批老合营企业的资方代理人摘掉“帽子”。这里“摘帽子”范围仅限于老合营企业中没有剥削或剥削轻微的资方代理人,

尚未涉及资本家; (2) 凡不是资本家的不要戴资本家的“帽子”。按照 1950 年 8 月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 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都属于劳动人民, 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很好地区分小业主与资本家, 文稿对两者的区别界限进行讨论, 但存在两种不同看法; (3) 对新合营企业的资方代理人戴不戴资本家“帽子”也有三种不同意见; (4) 讨论了摘帽子的形式、工龄计算、加入工会等相关技术问题, 讨论中亦有不同意见。

按照上述初步设想, 从 1956 年开始, 将有一批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代理人要摘掉资本家的“帽子”, 参加新公私合营企业的非资本家不戴资本家“帽子”, 部分新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代理人 (如没有股份或股份很少的职员) 也可以考虑不戴资本家的“帽子”。这表明在毛泽东许诺资本家将来可以变成工人阶级后, 中央高层确实一度对资本家“摘帽子”问题有所考虑, 并提出了初步实施设想。当然, 在讨论中意见还不统一, 说明当时设想还很成熟。

除了上述中央有关部门外, 北京市委统战部、常州市委在公私合营高潮前也曾对资本家“摘帽子”问题有所考虑。

1955 年 11 月 14 日, 北京市委统战部曾具体地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中一些政策性问题的意见。其中, 第八个方面是合营后资代 (资本家代理人) 和小业主的对待问题, 实际上就涉及了资本家的“摘帽子”问题。文件作出了四点规定:

(1) 原资方代理人, 企业合营后已不再代表资本家, 而且安排为一般职员或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 如本人要求摘掉资代帽子, 可以给他摘掉, 成为合营企业职员。如劳动和学习表

① 《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方针、政策、措施的问题和意见》, 江苏省南京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4049—2—5。

② 《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方针、政策、措施的问题和意见》, 江苏省南京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4049—2—5。

现较好，经工人同意可以参加工会。

(2) 原为手工业和连家铺的小业主，自己参加劳动，并厂并店和全行业合营后，仍然应该算做小业主，不应该算做资本家，其股金照发股息。一部分小业主资金少，主动要求放弃股权摘去私方帽子，劳动和学习表现好的，可以让他们摘去帽子，资金和股息暂存企业使用。

(3) 企业合营经清产核资定股后，一部分从业资方已无资产而要求摘帽子的，应该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即解放前和解放后长期为工人或店员，参与剥削年限较短，合营后直接参加劳动，表现较好的，可以摘去资本家帽子。但原为世袭资本家或解放前后长期剥削雇佣劳动的，现虽无资产，仍然应该当做资本家对待，暂不允许其摘去帽子，以督促其进一步改造思想。

(4) 原私营企业中资方家属直接参加劳动和当职员的，有的也被算做资本家，企业合营后，如本人无股份，参加劳动的，可以不当做资本家对待。^①

不难看出，北京市委统战部虽然没有考虑老合营企业资方代理人的“摘帽子”问题，但对新合营企业中“摘帽子”和不戴“帽子”问题有较为具体的设想，涉及资方代理人、小业主、无资产的资方、资本家家属等众多群体。

1956年1月13日，常州市委也对“摘帽子”问题作出了几点初步设想：(1) 一般条件，放弃剥削，自食其力；(2) 1955年前合营的企业，对没有剥削的资方代理人和已经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可以考虑经过上级批准，摘去一批。(3) 新合营的企业，凡不是资本家的不要戴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有股份的工程技术人员，私营期间担任资方代理人，和职工关系不太恶劣者，在合营后，如本人要求也可摘去帽子。”^② 常州市委的设想虽较为简单，但“摘帽子”范围却有所扩大，将“已经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也纳入“摘帽子”的考虑范围。

从前述三个档案文件来看，在毛泽东许诺将来资本家可以摘掉“帽子”变成工人后，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省市在高潮前则进一步对资本家“摘帽子”问题有过初步设想和考虑，其

实质是企图将原来的远景规划从1956年开始逐步付诸实施。按照这些设想，从1956年开始，有一批老合营企业中的资本家代理人乃至资本家可以摘掉资本家“帽子”，新参加合营企业的小业主、一些直接参加生产经营的原私方代理人以及资本家参加劳动的家属子女等则可以不戴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前者人数尚十分有限，而后者人数则非常可观。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只要加入公私合营，大量非资本家的工商业者实际上就可以不戴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

四、高潮中摘掉资本家的“帽子” 似乎已指日可待

当各地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后，很多工商业者对于将来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而变成工人阶级这一光明前途，普遍感到非常兴奋和欢欣鼓舞。

据北京市反映，资产阶级代表性人物和青年资本家，“对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对当‘核心分子’和争取改造为工人阶级很兴奋”。在北京市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讲话后，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蚌源委托行资本家曾孝先说“我听了传达后，感到无比的兴奋，当时不觉跳了起来喊毛主席万岁。”政治上比较落后的×××也表示“最兴奋的是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列。”有的青年资本家表示“我钱也不要了，只要给我摘掉资本家的帽子。”^③

据江苏省各地反映，工商业者对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的光明前途感到欢欣鼓舞，有的甚至已迫不及待。徐州市印刷工业主委董玉祥说：“过去不知怎样深入改造，现在知道仍是和平转变，毛主席开了支票，保证到社会主义转变为

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23页。

② 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等编《历史性的变革——常州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4页。

③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第353—354页。

工人阶级，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尤其是一些青年资本家对于摘掉资本家帽子更是迫不及待，甚至觉得15年时间过长。如徐州市代理业王青才问“到全民所有制，是否都要等到十五年？”南京市潘经鹏说“企业是父亲的钱，我戴上了这个帽子，国家赎买我们的生产资料，这个钱我拿出来赎买我的工作岗位，早一点放弃剥削。”^①

武汉市资本家也对通过改造可以转变为工人阶级很感兴趣。小生产者出身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改变成分，归队做劳动人民；资本家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分，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认为自己“三分之二的日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积极主动争取早日改造成劳动者”^②。

由于形势发展迅猛，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飞快发展的形势面前，北京市工商业者似乎觉得摘掉资本家“帽子”已经指日可待了。当时工商界把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看成是“鲤鱼跳龙门”，仿佛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已经触手可及了。1956年1月15日，北京举行庆祝公私合营大游行时，资本家举出“兴高采烈跳龙门，一心要做劳动人”横幅，便是工商资本家要求做一名劳动者的心态写照。当时报纸上还登载这样一个具体事例。北京义和机器厂经理徐世清的小儿子问他“爸爸，学校都是说工人叔叔最好，你是不是工人？”徐世清怕幼小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剥削者难为情，一直不敢正面回答儿子提出的问题，当他获悉批准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以后，很高兴地告诉儿子“你爸爸快要变成工人了。”^③

北京市率先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各地随即跟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各地资本家，特别是青年资本家对于摘掉资本家的“帽子”都感到极为兴奋。如1956年1月18日，上海团市委和市民青联联合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会。当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张祺说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将来放弃了剥削，变成劳动者，

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的时候，全场沸腾，出席大会的工商界青年激动地把帽子抛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阶级万岁！”会上，代表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争先恐后地发言，很多代表在台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的热泪盈眶。^④

应该说，在传达毛泽东指示后，资本家对于将来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这一光明前途感到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那么，为什么工商业者在高潮中似乎觉得摘掉资本家“帽子”已经指日可待呢？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这是工商业者在飞快发展形势面前所产生的心理预期。由于形势发展迅猛，原计划还要两年才能基本完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在短短一两个星期内就一举实现了，很快就要进入“社会主义”，因此，很多工商业者以为“摘帽子”指日可待了。

第二，工商业者受到政府对资本家摘掉“帽子”初步设想的有力推动。前述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省市对资本家“摘帽子”的初步设想，应该在高潮中已经向工商业者透露和传达，有的地方可能已准备付诸实施。因此，一些老合营企业的资方代理人就有望可以摘掉资本家“帽子”，众多小业主与部分原资方代理人 and 资方家属子女等加入公私合营后就可以很快不戴或摘掉资本家“帽子”。对于这一推测，笔者尚未找到直接证据，但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间接证据。在1957年5月7日无锡市工商联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机翻业许尔珊说“据反映去年（即1956年——引者注）工会动员私方的子

① 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本省各地贯彻全联一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情况与当前工商界思想动态的汇报》（1955年12月2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002—1—18。

② 水世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武汉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2册，1986年，第145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927页。

女入会，催办手续催得很急，表填了现在不声不响，影响了他（她）们的积极性。”联合工场薛嘉珍说“过去一催再催，现在音信全无。”^①虽然这里反映的问题是无锡工商业者对于私方子女加入工会的愿望未能实现的不满，但可从中看出，1956年无锡市曾经准备让私方子女加入工会，实际上也就是不让他们戴资本家的“帽子”，这一做法与前述北京市委统战部第四条规定的精神也是基本吻合的。再进而推断，无锡市很可能也像北京市、常州市一样有过资本家“摘帽子”的初步设想，并已经付诸实施，只是后来又因故缩回去而未兑现。另外，在高潮中，许多小业主、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都坚决要求加入公私合营而不愿选择合作化，说明他们并不担心自己会戴上资本家的“帽子”，由此也可以推断他们对于前述政府的初步设想是了解的。

遗憾的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工商业者摘掉资本家“帽子”的愿望却并没有实现。当时参加公私合营企业的工商业者，包括资本家（含资本家代理人）和众多小业主以及一些小商贩和手工业者都一律称为私方人员，实际上都保留或戴上资本家的“帽子”，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遗留问题才得到解决。资本家摘掉“帽子”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原因极为复杂，需要分别不同时期来进行具体考察，而这只能有待笔者另文来专门论述了。

（本文作者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南京 210013）

（责任编辑 薛 承）

^① 无锡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召开座谈会情况的汇报》（1957年5月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002—2—39。

（上接第76页）象征意义的“符号”。在整个中国社会对孙中山逝世的相关评论中，中共显得独树一帜。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撰写了相关文章，不仅主题集中、观点鲜明，而且文章的论辩模式、阐述方式也遵循基本相同的逻辑思路。再结合此时共产党人对“反帝”“民族革命”“世界革命”“阶级斗争”等问题的论述，建党初期的中共借此也初步构建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关于孙中山逝世的宣传是中共早期宣传史上的重要事件，比较充分地展现出当时中共的整体宣传实力，更体现出早期中共作为一个年轻政党的基本运作模式。在孙中山逝世所留下的权威真空中，共产党人，苏俄代表以及国民党的内部派别都参与了这场斗争。从当时的情

况而言，可以说中共一度明显占据上风。

中共建党初期的宣传工作不是坐而论道，不只是纸面上的辩论，而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斗争性。在不掌握独立武装力量的情况下，“笔”成为中共依赖的重要武器。然而，无论如何，“笔”永远无法真正抗衡“枪”的威力，宣传层面的胜利毕竟不能取代现实斗争的胜利。当对手将“枪”投入战场后，“笔”的脆弱性立即充分显现，有时甚至不堪一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宣传工作始终是外在的。对于中共而言，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后，也必然走上“笔”与“枪”共用的道路。

（本文作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 王志刚）